



历史 背影

贾植芳 著

一个敢把牢底坐穿的人记录如烟往事

LISHI
BEIYING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历史背影

贾植芳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背影 / 贾植芳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399-2722-0

I. 历… II. 贾…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3890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书 名 历史背影

作 者 贾植芳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特约编辑 张克俭

美术编辑 兰 馨

责任校对 李宏伟

责任监制 卞宇坚 江伟明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发行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北京九章图文设计

印 刷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722-0

定 价 1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为“中国人物系列”和“中国往事系列”而作

李 辉

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生活如以往一样，每天都在流动。但是，流向何处，如何流动，谁能说得清？面对现实的丰富多彩和变化莫测，我们的困惑，或许更多于兴奋。

君不见，启动电脑，走进电子网络世界，铺天盖地的信息汹涌而来。电子网络如此快捷如此便利，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一个事件名称，键盘轻松一敲，几秒时间它跟随搜索引擎走遍了世界各地百万千万上亿网页，瞬间就把搜寻结果呈现在你的面前。

这的确是一个奇异的世界，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扑朔迷离的事件、光怪陆离的景象，以及众多大小的人物的命运，似乎都被一网打尽，再也不会被忽略，无论是谁都可以神游其中，与历史亲密接触。

然而，这只是一种可能。我们每日看到的还有另外一种景象：娱乐化挟电子网络之便利而蔓延。历史被戏说，被删减，甚至如同电脑文件一样被格式化。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健忘几乎在每个年龄层次的人群都普遍存在。不同历史阶段众多事件的来龙去脉，今昔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若隐若现，人物性格与命运的丰富多彩，诸如此类与民族记忆密切相关的内容，很难说不会被慢慢消解而散——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现实情况不正是这样吗？人们习惯于臧否时事，慷慨激昂大发宏论，或者在网络世界以片言只语挥洒激情。但有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立足的历史叙述，很可能不是坚硬的石头，而是一堆由片面、偏颇、甚至偏见构成的沙丘。有的人往往自以为洞悉一切，其实所知甚少。历史的许多细节，彼此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早已变得陌生。某些今日发生的国内或国际事件，

初看起来清晰明了，我们哪里知道，许多事情其实背后早就有复杂的历史原因纠缠其中，远不像非此即彼如此简单。问题是，我们很可能对此无从知晓。或者，纵然有心，也无能为力了。

幸或不幸，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境之中：一方面，电子网络的空间迅疾拓展，历史与现实的容量可以放大到难以想象和预测的无限；另一方面，历史的叙述则又逐步萎缩，许多曾经重要的人物的名字逐渐被淡忘。

作为一个写作者和历史爱好者，我常常感到困惑。欣喜还是悲观？哪里说得清楚。

不管如何，写作者和出版者，还是应该积极应对电子网络的挑战，于坚韧沉着之中，将历史记忆尽可能地清晰地呈现出来。它们是故事，是细节，同时也是知识，是思想。星星点点，方方面面，不同时期不同人亲历的一切，不同领域不同性格的人物，一旦汇集起来，将为人们了解历史提供丰富的文本。

走进电子网络虚拟世界，我们脚下踩着的，却应是一块坚硬的基石，而不是一片轻飘的浮萍。

“中国人物”与“中国往事”，相对独立，各有侧重。但实际上互有交叉，很难有绝对清晰的区别。事中人，人之事，又如何能分开？

“中国人物”主要选编某一作者关于不同人物的印象记，同时，兼及人物传记。不同的选本和传记一旦汇聚一起，就将形成中国各界人物的群体形象，从而有可能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廊，使读者对历史的触摸，因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强烈反差而变得生动起来。

“中国往事”则以事为主，由事入史。主要采取集中描写同一主题的方式，或个人一生扫描，或某一事件描述，突出亲历者的回忆，其叙述也尽量立足于历史文献的记录。

两套丛书体裁有别，但贯串其中的文化品位和精神追求应是一致的。这就是：尊重历史，强调客观，注重细节，突出多样性。

是为序。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九日，北京

目 录

关于胡风

我与胡风先生的交游史 / 001

悲痛告别——回忆胡风同志 / 013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晓风著《胡风传》序 / 023

关于梅志

悼念梅志先生 / 027

关于巴金

一点记忆，一点感想——悼念巴金先生 / 029

关于邵洵美

我的难友邵洵美 / 033

“人生何处不相逢”——《邵洵美文集》序 / 041

关于郑超麟

一位值得纪念的长者——郑超麟先生 / 044

关于余上沅

纪念余上沅先生 / 051

关于萧军

萧军印象 / 056

关于还珠楼主

记还珠楼主 / 060

关于周瘦鹃

我看周瘦鹃和鸳鸯蝴蝶派 / 065

关于范希衡

范希衡先生和《中国孤儿》 / 068

关于陈瘦竹

我与陈瘦竹先生的交友 / 074

关于覃子豪

忆覃子豪 / 077

关于路翎

一双明亮的充满智慧的大眼睛 / 090

关于庄涌

怀念庄涌——《庄涌和他的诗》序 / 096

关于王瑶

我的老乡王瑶先生 / 098

关于卢扬

迟到的悼念 / 104

关于潘世兹

我的后来者 / 108

关于尚丁

忆尚丁 / 113

关于范泉

一个不能忘却的朋友——范泉 / 118

关于林同济

忆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 / 124

关于王中

回忆王中 / 128

关于陈仁炳

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悼念陈仁炳先生 / 132

关于公木

背影 / 137

关于朱锡侯

纪念老友朱锡侯 / 141

关于罗平

歌声——沉痛悼念罗平难友 / 146

关于施昌东

悼念施昌东 / 153

关于戴厚英

她是一个真实的人——悼念戴厚英 / 159

我与胡风先生的交游史

前记：今年十月初，我应母校——东京日本大学文理学部部长濑在良男教授邀请，偕老伴任敏重游东瀛，回校访问和讲学。本讲稿曾先后在东京大学山上会馆举行的日本中国学会“前夜祭”及日本大学的中国文学会上讲演。两次讲演都是由日本大学今西凯夫教授担任口译的。

山口守先生来信说，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们希望我谈谈我和胡风先生的友谊历史或我在胡风事件中的经历等。我谢谢诸位朋友的关心！那我就在这里随便谈谈，我也希望各位先生在我的讲话中插话或提出问题，我们这个聚会，能成为一个大家的漫谈会才好。

我和胡风先生的友谊，正如前几年我在一篇追悼胡风先生的文章中所概括的：“时代命运的播弄，反而加深了我们相濡以沫的情谊。我们夫妇与他一家大小的友谊，就是这么在历史的风风雨雨里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的。”^{〔1〕}

在一九五五年中国发生了所谓胡风事件后，人们纷纷议论说，贾植芳为什么会和胡风成了朋友？论年龄，他比我大十三岁，他在一九〇二年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我是一九一五年出生于山西省襄汾县，他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地域相距几千里，因此可谓非亲非故。我们都算留日学生，他来日本留学的时间比我早，离开得也早。他是因为参加一九二五年中国

〔1〕《悲痛的告别——回忆胡风先生》，《良友》一九八六年第二期，香港版；又见北京版《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七年第四期，改题《片断的记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贾植芳与胡风等朋友在一起。前排左起：罗洛、朱谷怀、冀汭；后排左起：路翎夫人余明英、路翎、胡风、贾植芳、任敏。

大革命运动，后来在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的白色恐怖中，于一九二九年流亡到日本留学，并在庆应大学英文科学学习，又因为参加了当时日本左翼文艺运动和日本共产党，被日本警察逮捕关押后，于一九三三年被驱逐回国。我则是因为参加了一九三五年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北平被警察逮捕关押后，跑到日本亡命兼上学，进入日本大学社会科学学习。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立即放弃学业，回国参加了神圣的抗战事业。我们虽然是不同时代的留日学生，但都算是政治亡命兼留学，在这一点上则是相似的，而这一点又正是我们后来成了朋友的根本原因。胡风先生在晚年说：“虽然许多朋友因我受牵连，我也感到内疚，但是他们靠近我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理想，我更多地是出于一片爱才之心。”（见梅志夫人回忆录《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胡风先生在逝世前一年为他的论文集（出版时被改名为《胡风评论集》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曾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这是他在生死大难之后，对自己一生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的回顾和总结。在他从日本回国后，

参加了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工作，从而因工作性质关系，从接触一些作家和这个文学团体的成员开始，到协助鲁迅先生编辑《海燕》杂志。鲁迅先生逝世后，他又在党的有关领导人冯雪峰的授意下主编《工作与学习丛刊》，以至抗战爆发后，他从一九三七年创办《七月》，由上海，而武汉，而重庆，直到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七月》被迫停刊，一九四五年他重新创办和主编《希望》以及《七月诗丛》、《七月新丛》、《七月文丛》等文学丛书。在战前和贯穿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他编辑文学刊物的关系，在他周围，结集了一批越来越多的作家和他从读者中发现的文学新人，其中不少人又成为他的朋友，建立了友谊，以致形成了一个被称为“胡风派”或“七月派”文学流派，而到了一九五五年却又被打成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被看作这个文学流派的作者，这时大多被打成所谓“胡风分子”，从这时起，他们多数在文艺界消失了，失踪了。在他逝世前一年，他在为自己的评论集写的这篇《后记》里谈到和他们的关系时，不无辛酸地又说：“我检查自己，我和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以致没有割断联系，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对人民（革命）的共同态度，对文艺工作的彼此思想和感情上的交流。”这也就是一九五五年发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把这个文学流派，定性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的原因。而我就是他前后所主编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七月》、《希望》、《七月文丛》的一个撰稿人。

我和胡风先生相识，是通过投稿关系开始的。那正是我来日本上学的时期，我虽然在日本大学读社会学，但我热爱文学，从三十年代初间就开始学习文学创作，在报刊上投稿，也参加了一些进步的社会活动。所以到东京后，除了上课，参加留学生的文化活动，业余仍不放弃文学写作。我生平喜欢逛书店，在东京时期，总习惯地到开设在神田区的内山书店溜溜，因为它专门经营中国新出版的图书，所以我把这家书店看成是了解国内政治、社会、文学动态的一个渠道。一九三七年初，我在这家书店看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的第一、二两本，从它的编辑风格、撰稿人员阵容我惊喜地发现，这是一个坚持和发扬鲁迅的战斗文学传统的严肃文学刊物，因此，把自己这时期写的以来日本前的监狱生活为背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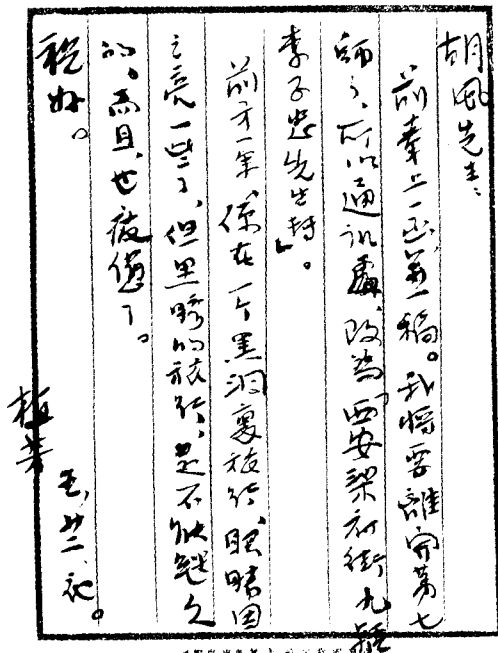
小说《人的悲哀》向这个丛刊投稿。当时我并不知道它的编者是什么人，所以也没有写信。过了不到两个月，我就收到刊登了我的小说的丛刊第四本《黎明》和三十多元日元的稿费，与编者胡风的热情来信。

从这封来信我才知道，这个丛刊的编者是胡风先生。而胡风可以说从三十年代初期他用笔名谷非写作、翻译开始，我就是他的一个老读者了。也就是说，我从他的著作和翻译，早就认识了他，也可谓“神交”已久。我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又是诗人和翻译家。在中国文坛上，属于左翼阵营的革命作家，又是鲁迅先生晚年的忠实助手。我从鲁迅先生在逝世前写的那篇《答徐懋庸并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文章里，又认识了他为人的品质，鲁迅先生对他的生活性格和文风的评价。鲁迅先生为他被“四条汉子”轻信转向者穆木天的流言，因而使胡风在政治上受到诬陷鸣不平的话：“胡风耿直易于招怨”，这句话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以致一九四八年为讨论主观问题，胡风受到在香港的同一阵营里的同志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对他更大规模的批判时，我都想到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其实，我这种观察和看法，只是皮相之见，并不能概括胡风所

遇到的这两场政治性灾难的本质。咎不在他，这在今天看来，是洞若观火的。）同时，也是从这篇文章，我粗略地了解到在左翼文艺阵营里胡风和左联党团负责人周扬等人之间的纠纷和矛盾。现在的研究者都说，这就是一九五五年“反胡风”斗争那场冤案的历史根源。我在这个历史时期通过投稿结识了胡风，并在后来成了比较亲近的朋友。因而正是从这时起，种下了一九五五年反胡风时我受到株连的根子。

一九三七年秋，我在抗日民族战争中

一九三九年致胡风书信手迹



回国，投身于社会。在那个战乱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里，我没有做一个坐在书斋里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学者，过比较平静、安稳的生活，而且我也不屑于在祖国烽火连天中做这样的学者；更没有做发战争财的商人，虽然我是商人家庭出身；但我又没有去找一个安定的职业，只为个人的生计操劳，而是把有机会到手的工作当作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祖国和人民的脱离历史的苦难，走向新生应尽的历史责任来从事。我这种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我这种不合时俗的生活态度，使我在动荡的时代里，东奔西走，在生活中遭到打击，遇到挫折，使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坎坷和灾难。我从日本弃学回国后，先是在山西中条山一带作战的正规军部队里担任日文翻译和宣传工作，不到一年，即一九三九年，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第一次政治上的大逆转暗流，我不得不逃离这个部队，辗转到了重庆。我先给胡风寄出一篇稿子《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这是我在山西战地访问一个八路军支队长的报告文学作品，并附言告诉他说，我已到了重庆，被朋友安排在一个报馆里工作。信写得很简单，虽然在这以前，当胡风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办《七月》时，我就给他投稿，并成为这个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到了山西战地后，继续给他投稿、通讯，并被他约为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这次我到重庆给他寄稿子，信上没有写报馆的名字，原因很简单，我那时性情比较孤傲，不愿意拜会名人。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我有一种想法，作为一个青年文学写作者，最好把写作当成一种业余活动，文学界是个是非之地，最好置身其外，不要混在这个圈子里；况且我还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人，对社会、人生认识得不够，体会得不深，需要在实际生活里锻炼自己，深入体会和认识社会与人生，了解中国的“国情”，积累生活的经验，开拓写作的素材。因此，正如一九三八年夏天在武汉，我虽然和胡风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我只是通过投稿和他建立通讯关系，并没有打算去拜会他。我们之间只发生了一种文学和思想上的联系，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文字之交”、“以文会友”的意思。

但胡风先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在接到我的信不到三天，他就自己找我来了。他说，因为我没有写报馆的名字，找得他很苦，几乎跑遍了重庆的各家大小报馆，才在这里找到我了。他说，我在山西战地给《七月》写

稿，还有些稿费，因为给战地寄钱不便，还存在他那里，他也随身带来了。胡先生的这次来访，使我很激动，也使我亲身体会到他的热情和纯真的为人品质和作风。他完全是一个平民化的知识分子的朴素形象。这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真正订交的开始。这以后多少年了，我和他也算是交往较深的朋友，但我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任何利己主义、虚伪、圆滑等庸俗的市侩习气的东西，或盛气凌人，自认为高人一等的那些官僚化文化人的恶劣行为。他是个讲信义，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一如毛泽东评价鲁迅先生那样：“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他是对人民革命的文化事业忠诚无畏的革命作家，是一个可以相交、相信、相托的真正朋友。但这次我在重庆停留了不到三个月，就被安排我在报馆里工作的地下党朋友，分派到国民党在山西的一个新闻机关去工作，不得不离开重庆。但这次在重庆和他相处的日子，却留给我一段美好的回忆。

那时，他家住在重庆的郊区北碚。他说，重庆大轰炸后，梅志和孩子们就搬到了乡下。《七月》的编务，包括看稿和作者通讯联系，跑印刷厂，设计封面，看清样等杂务，都由他一个人唱独角戏。他进城总是事先写信通知我，约我在一块儿相聚谈叙，多半是在他在重庆租的那间斗室内，我们各坐一把藤椅，或到化龙桥一带坐茶馆，遇上吃饭时间，就找个小馆子吃点面，或几个烧饼。他还领我到一家湖北点心店，吃他们家乡的土特产点心——豆皮和汤圆。每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海阔天空地什么都谈，谈文学，谈文坛，谈个人身世和生活，也谈抗战形势。他谈到国内政治形势和他的处境时说：“我仿佛被装在一个口袋里，形势一变，只要人家把束口袋的绳子一拉，我就跑不了了。”我从他的激奋的语气里，体会到他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是清醒的，他的政治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对一贯敌视和迫害进步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国民党政权是极端憎恶的。这也反映了他在险恶的政治文化环境里，坚持自己的工作岗位的决心与魄力。

在他那间小屋里漫谈的时候，他还翻给我看堆积在写字桌上的那堆稿子，它们都是投向《七月》的来稿。记得其中一篇用毛笔写在白麻纸上的稿子，它的作者署名是“黄既”，这是一个题名为《麻油》的剧本。胡风说，这个作者过去还寄来过一篇写军人生活的报告文学。他说这些作品很有生

活实感，作者感情也是真挚的。它的作者是一个在解放区工作的医生，是从延安寄来的等等。对于胡风重视和发掘从生活深层来的青年作者的来稿，我是有亲身体会的。他的编辑风格，可以说是继承了鲁迅先生的编辑传统，他编的杂志取稿的标准，不以作者的名位为准，而是完全看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而定。他本人就是一个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在他长期从事编辑生涯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七月派”这个文学流派，其中绝大多数作者，可以说大都是通过投稿关系和他结识，并被培养成作家、诗人的。但是他这样严肃认真的编辑态度，在无形中得罪了一些已知名的作家，他被扣上“宗派主义”、“小集团”的帽子，大概与这一点不无关系。

一九四一年中国发生了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我那时早已从地下党同志介绍我工作的岗位上逃离了下来，困居在西安，和一些小商贩混在一起，做些小买卖混生活，有时还得靠家庭接济。但主要是自己读些书，写点文章，也只能给自己看看，因为我不愿意把自己的文章拿给那些不三不四的报纸和刊物发表。我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严肃的事业，它不是单纯的吃饭手段和谋生方法，更不是掠夺个人的荣华富贵的“敲门砖”。这时我已和胡风先生及外界好朋友失掉联系，和文化知识界完全处于隔绝状态。一次偶然从街头贴在墙上的报纸上得知，“皖南事变”发生后，胡风已离开重庆，远走香港，但在香港被日军攻陷后，“胡风殉难”了云云。这则新闻对我真如五雷轰顶一般，我在悲愤中不禁想起在重庆时，他对中国抗战形势和国内政局的分析。但是过了不久，我从当地出版的一份官方文艺刊物《黄河》上看到一条杂文式的报道说，“香港被日军攻陷后，左倾文人胡风已步他的同志袁殊的后尘，到南京的汪伪政府当了宣传部副部长了”云云。我当时看了这个报道，非常气愤，同时期我又在一份贴在街头的叫《中国人》的小报上看到同样内容的报道。我认为这是国民党文痞对胡风的恶意造谣中伤，而且从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来说，这又不只是对他个人的中伤问题。因为我完全相信和我已经成了朋友的胡风的政治道德品质。直到看到胡风回到桂林，在一份文艺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是《死人复活的时候》（这是借用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个剧本的题名），对这些无耻的谣言进行了有力的回击时，

我才感到安慰和快意。我前面说过,因为这不只是关系到他个人荣辱的问题。不久,我在报上看到他回到重庆,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消息,喜悦中忙给他写了问候信,立即就收到他的回信。信上说,他回到重庆后,在一次集会上听到我的一个留日同学说,他听说我流落在西安,处境很狼狈,他对我的生活非常关心。这当中,由于我不善于经商,一点借来的本钱反倒被人骗光了。为此,我又第二次从军,到驻扎在陕西黄河沿岸的国民党一个工程兵团,当翻译糊口,替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出身的团长翻译日本的工程兵书籍,如《工程兵教练法》、《烟幕使用法》之类。这时我与早结识的在西安上大学的妻子任敏同居。但干了不到两年,又被这个部队怀疑,认为我来历可疑,有什么非法活动,并已决定了处置的办法:就地活埋。因为当时国民党政权已命令它的驻在西北地区的党政军机关部队,指令凡是发现“异党分子”和“左倾分子”可就近处决。团部一个姓王的小职员(文书)听到这个讯息,跑来告诉了我,我与妻子设法逃出了这个部队。这时我就决意离开西北,我把这些年写的小说等文章,检出其中我认为比较满意的都一块儿寄给了在重庆的胡风,其余的都扔到一个废井里去了,并告诉了他我们要离开西北的讯息。这些小说后来由他分别发表在新创刊的《希望》上面,后来得知,有几篇发排时被印刷工人遗失了,还有的被他介绍到《抗战文艺》上发表。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由他把他经手发表的我的小说作品收集成一个小说集,题名《人生赋》,作为他所主编的《七月》文

丛之一,一九四七年春天由上海的海燕书店出版。

在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之前,我辗转到徐州后,又被当地的日汪警察局特高科以策反罪逮捕关押,那大约是一九四五年的五月底六月初的事。到了“八·一五”战争结



一九八〇年冬,贾植芳与在胡风集团冤案中幸存难友合影于复旦大学。前排左起:贾植芳、任敏、耿庸;后排左起:张禹、王戎、何满子。

束，即日军投降后，我才被释放出狱。这时我在上海报纸上看到了胡风回到上海的讯息，又和他恢复了通讯投稿关系。我们夫妇跑到上海，大约是一九四六年五、六月间的事。到了上海后，因为没有条件找房子，我们就暂借住在胡风家里，有近半年之久。这时中国正在激变之中，我可以说是从这时起才正式下海卖文为生。同年底被胡风介绍到一个名为《时事新报》的报纸编一个文艺周刊。这个报纸当时属于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财团，它的总经理胡鄂公是胡风的湖北同乡，原来是个共产党地下党员。从一九四七年一月起，我正式为该报编名为《青光》的文艺周刊，但编了两个月，共出了八期，由于中国政治形势的日趋恶化，政治协商会议的破裂，国共两党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冲突开始激化和扩大化，这个副刊也就被迫停刊了。

一九四七年夏天，中国发生了名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这时我应当时的地下报纸《学生新报》之约，为这个学生们办的报纸“五四”纪念特刊撰写了一篇名叫《给战斗者》的短文，被这个特刊约请撰稿的还有郭沫若、马叙伦等当时著名的民主人士。同时，我又应复旦大学学生们办的小报《文学窗》的邀请，写了一篇短文《暴徒万岁！》，因为当时的官方报纸，称上街游行的学生们为“暴徒”。经人告密，我们夫妇就与几个同住的学生，也是《学生新报》的人员，于九月间突然被国民党中统局特务逮捕，被认为是“煽动”学潮。关了半年多，他们向我提出带我带他们去抓胡风，或将胡风住址告诉他们作为释放我的条件，被我断然拒绝。他们又改为要我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反共宣言》，作为释放我的条件，也被我拒绝了。于是又继续关押下去，到了一九四八年冬初，才被朋友托人保释外出。我出狱后，才听先我出狱的妻子说起，胡风夫妇除过关心她、照顾她外，还积极为营救我四处奔走。因为胡风先生在日常闲谈中曾经听我说起，我在抗战中在国民党那里工作时，认识国民党一位军人叫陈卓的，因此胡风才给在南京的阿垅写了一封信，要他找这个陈卓保释我，但正如胡风一样，阿垅也不认识这个陈卓，因此也无从找起。但一九五五年发表的关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里，竟以胡风给阿垅的这封信为依据，断定这是“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们